

库尔班大叔的家风

□ 范景鹏

20世纪50年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的贫农库尔班·吐鲁木“骑着毛驴上北京看望毛主席”的故事，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并广为流传，成为那个时代人们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人们把这位善良、勤劳、质朴的维吾尔族老汉亲切地称为“库尔班大叔”。201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家住新疆和田地区的库尔班·吐鲁木的长女托乎提汗·库尔班回信，又让我们重温这段红色经典和民族团结的佳话。几十年过去了，库尔班大叔后人秉承爱党爱国、拥军爱军、民族团结、建设家乡的良好家风，为各族人民树立了榜样。

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库尔班·吐鲁木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发自内心地感激中国共产党、感激毛主席，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他把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融入到坚定不移跟党走实际行动中去。1959年7月入党以后，他说：“我热爱毛主席的感情不同了。从前的库尔班·吐鲁木，是为感恩而热爱恩人，现在我变成了一个无产阶级战士，同毛主席是亲爱的同志。毛主席所领导的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成为我终身的奋斗目标。”1964年，库尔班·吐鲁木在给毛主席的信中写道：“我要教育下一代，永远跟着党和您走。”50多年来，在库尔班大叔的影响下，他的子孙们把老人的高尚情怀和光荣传统作为传家宝，一代一代传下去，坚持几十年如一日，几代人共同遵守，始终保持一

贯家风。

长女托乎提汗常常追忆父亲上北京受到毛主席接见时的情形，教育孙女如克亚木·麦提赛地：“当年，你太爷爷骑着毛驴见毛主席就是为了感谢党、感谢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更应该感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感恩伟大祖国。”于是，如克亚木按照奶奶的愿望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信，讲一讲一家人的幸福生活以及家乡的发展变化，很快就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笔回信，高度赞扬了库尔班大叔的家风，“希望你们全家继续像库尔班大叔那样，同乡亲们一道，做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模范，促进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创造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全家怀着无比崇敬和感恩的心情，将维吾尔语、汉语两种文字书写的回信装裱起来，挂在客厅的墙上，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爱党爱祖国爱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优良传统形成家风发扬光大。2017年，库尔班家族里又有两位成员写了入党申请书。2018年1月1日，托乎提汗·库尔班又一次召开家庭会议。像往常一样，家族成员以她为中心，围坐周围，一圈又一圈，商议如何以实际行动表达对总书记对党中央的感恩和热爱。

拥军爱军四代传情

早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之初，毛泽东指示王震，你们到新疆去的主要任务是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强调：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以及其他民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

新疆。驻疆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胜利地进行了剿匪平叛斗争，积极参加地方建党建政工作，结束了新疆人民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and 爱戴。

库尔班·吐鲁木是新疆人民拥军爱军的模范，一曲《库尔班大叔您上哪》传唱至今，经久不衰。他一直希望儿女能参加人民解放军，但由于身体和年龄原因，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成了库尔班大叔的一个遗憾，他留下遗训：“我库尔班的后代，能从军报国最光荣！”拥军爱军的传统代代传承到了曾孙女如克亚木。她于2012年底通过了体检和层层选拔，应征入伍，终于圆了这个维吾尔族大家族四代人的从军梦。离开家乡时，所有得到消息的亲戚们都来到托乎提汗家，共同庆祝。父亲给如克亚木上了半个晚上的“课”：“一定要好好当兵，用最优异的成绩为祖爷爷、为家族和家乡争光。”她牢记家人嘱托，在训练中不叫苦不叫累，工作中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从完全听不懂汉语、完全不谙专业，到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上熟练的通讯兵，也是航母上的第一批少数民族女兵。从新疆到大海，相距4000多公里；从20世纪50年代到今天，跨越半个多世纪；从库尔班大叔到航母女兵，历经四代人。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经历，他们却用自己的故事，传承着一个家族拥军爱军的家风。

民族团结一家亲

新疆解放之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强调：“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吾尔族的紧密合作。”库尔班·吐

鲁木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委员、和田地区革委会委员、于田县革委会副主任等职，既是新疆各族优秀党员的代表也是民族团结的模范。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他都向乡亲们积极宣传党的政策，配合各级各族领导落实好党的政策，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民族团结。库尔班大叔的后人都把维护民族团结作为重要家风传承和弘扬。2016年，在新疆自治区召开“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中，托乎提汗家和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结对认亲，像亲戚一样看望走动。托乎提汗老人有7个子女，其中2个是干部，5个在农村务农，有4人是共产党员。二儿子麦提赛地·艾萨自筹资金设立“库尔班·吐鲁木感恩祖国家庭公益基金”，用于奖励、慰问和帮助在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受到伤害的无辜群众以及家庭困难的学生，继承和弘扬库尔班大叔感恩共产党、热爱伟大祖国的优良传统，服务新时期民族团结大发展。小儿子依明江·艾萨在于田县兰干乡从事统战工作，积极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如克亚木退伍复原回到家乡，成为一名宣传干部，把库尔班大叔爱党爱国的精神宣传到家家户户，教育和引导各族群众共同维护民族团结。她坚定地说：“身为库尔班的后人，感恩、听党话、跟党走是流淌在我血液里的基因，我要把曾祖父的故事永远传颂下去，一代一代发扬光大，永远做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模范。”

热爱劳动热爱家乡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库尔班·吐



毛泽东接见库尔班·吐鲁木

鲁木把对共产党的深厚感情，化作争做劳动模范、民族团结模范的坚强动力，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曾说：“劳动是最宝贵的，它能使人走向幸福。”他在北京见毛主席后，又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率先垂范、兢兢业业、埋头苦干、默默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不愧为全国各族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敬仰。库尔班大叔的后人都秉承了老人热爱劳动热爱家乡的家风，在各自的岗位上创造美好生活。长女托乎提汗自幼跟随父亲在田间劳动，青年时还担任村生产队队长。她的长子麦提图尔孙·艾萨是村里的铁匠，为村民制作生产、生活用的工具，服务家乡。库尔班大叔的小儿子买买提·吐尔逊在克拉玛依市粮食局当一名搬运工，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新疆石油管理局领导了解到买买提·吐尔逊的工作表现和家人世后，曾让组织部找他询问是否愿

意调到更能发挥能力的岗位上工作。但他婉言谢绝了领导的好意，说“我能力有限，管理岗位不适合我，但我一定会努力工作，做一名合格的搬运工”，就这样，他一直工作到2004年退休。2017年4月2日，买买提·吐尔逊回到家乡，和姐姐托乎提汗一起在库尔班·吐鲁木纪念馆毛主席画像前追忆起父亲上北京受到毛主席接见时的点滴，重温父亲的教诲，不觉流下眼泪，在场人无不动容。情到深处，托乎提汗给大家唱起了《想念毛主席》。买买提·吐尔逊表示：“看着毛主席像，我就想起了父亲。我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一定把父亲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精神传承好。我们这个家族在全疆各地共有104人，都要在天山南北播撒民族团结的种子！”

史海拾贝

大数据：党建工作新抓手

□ 聂晓愚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2月8日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集体学习时强调，“大数据是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当前，与经济社会发展交汇融合，并呈现出爆发增长、海量集聚特点的大数据，也对新时代党建工作提出了新课题。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树立“智慧党建”的理念，充分运用大数据思维方式和技术手段，不断提升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

充分运用大数据提升党的组织建设的实时性。在组织建设的传统工作方式中，特定的时间段、党员集中“在场”、面对面的方式等都是开展工作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可以实现党的组织建设的交互化和扁平化，即通过党建网络平台、手机客户端（APP）等载体，使上级党组织意图的传达、党组织与党员之间的联络、“三会一课”以及党内教育活动等都可以实时完成并实现异地互动。特别是在城市和农村流动党员的管理方面，可以将“智慧党建”与网格化社会治理机制有机结合起来，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让流动党员“全时空”体会到党组织的“存在感”，从而有效解决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的问题。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还可以更加有效地了解掌握党员干部的思想动态。在传统的问卷调查、个别谈话等调研方式中，党员干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出于种种顾虑而刻意保留自己真实想法的可能性，以致调研结果失真。而通过大数据技术对日常化数据的处理与分析，使得对党员干部思想动态的深入、长期观察成为可能。

充分运用大数据提升党的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的精准性。在大数据时代，“一切皆有痕迹”。“四风”问题

及各类违纪行为一旦发生，必然会在各类信息系统中留有相关的记录。但这些信息数据往往由各个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分散存储和管理，没有实现高效整合和互联互通，因此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数据活力未能得到有效激发，使得很多隐蔽、变异的违纪行为逃脱了监督执纪的视野。要进一步树立“云治理”的思维，突破传统的“坐等线索上门”的监督执纪模式和“部门化”行政壁垒，变人为监督为数据监督、事后监督为过程监督、个体监督为整体监督，充分整合财税、工商、银行、公安、审计、巡视、信访、公车管理、交通管理等相关职能部门的数据资源，形成信息采集、汇总的协作机制，搭建数据共享平台，实现监督执纪流程具体化、精准化、可视化。通过对相关数据“异常值”的精准抓取、关联分析、比对研判，发现问题线索，深挖隐形、变异“四风”问题及其背后的腐败问题，及时发现和捕捉廉政风险点，最大限度地堵塞漏洞，压缩权力寻租空间。同时，要积极创新信访工作方式，完善违纪行为监督举报网络平台建设，支持和鼓励人民群众通过“随手拍”“一键举报”等方式开展“指尖上的监督”，真正让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动辄则咎、无所遁形。

充分运用大数据提升党的制度建设的实效性。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在传统的工作方式下，制度的执行往往有赖于人的主观因素，弹性有余而刚性不足。大数据思维方式和手段，为制度建设落实落地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有效载体。要树立“人在干、数在转、云在看”的制度建设理念，推动制度运行全程数据化、处处留痕迹，实现可查、可控、可追溯。要通过织密制度运行的“数据之笼”来增强责任意识、压实责任内容，让履职监督“进流程”，让问责程序“全固化”，使责任落实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又有利于循迹查责、依据追究，从而有效防止责任主体虚化和责任制“空转”。要进一步完善党内制度体系评估机制，积极发挥大数据“以全样本分析取代抽样调查”的技术比较优势，对制度运行情况开展全方位评估，以克服传统的抽样调查、个别调研所不可避免的影响因子涵盖不全面的问题，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制度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充分运用大数据全面增强党的执政本领。“全知就是全能”，是大数据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人民群众对党委政府治理绩效的要求也更趋个性化，传统的单向度、粗放型的治理模式难以满足人民群众需要。要通过进一步树立大数据思维，使各级党员干部形成新的治理观，养成用数据说话、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决策、用数据创新的工作方式，将心中有“数”的理念贯穿于决策的形成、执行、反馈和调控纠偏机制的全过程，通过大数据对公众需求的合理细分和对公众满意度的全面感知，形成多元互动、共建共治的治理格局，使施政行为更加精准、优质、高效，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百姓少跑腿”。通过大数据技术，还可以分析研判一个地区、一个时段内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从而及时打通民意表达的“最后一公里”。例如，通过抓取某一时间段内在地方党委、政府官方网站的群众留言、当地主要网络论坛的热点话题以及当地网民在搜索引擎上的搜索“热词”，运用大数据技术加以比对和研判，尽早发现相关的苗头性、趋势性问题，从而对突发事件和舆情进行有效的剖析化解和应急处置，防患于未然，避免出现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的“蝴蝶效应”。

党建视角

归庄，地处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高排乡西北（现为坪坑村归庄小组），西与晓龙乡毗邻。两乡交界处有一山，名曰天门峰。天门峰海拔725.1米，直立高耸，宛如屏障。80余年前，在这座人迹罕至的天门峰上，留守苏区的红军将士进行过极为惨烈的战斗，当年留下的战壕纵横交错，至今清晰可辨。这场战斗结束后，留守赣南的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及红军大部撤离了江西境内，因此它被认为是中央苏区的最后一场血战，史称“天门峰血战”。党的早期杰出的青年运动家、工人运动的先驱、中央红军政治部副主任贺昌在这场战斗中壮烈牺牲。

贺昌1906年出生于“山陕潼衢，晋西重镇”的山西省离石县柳林镇。他天资聪颖，早在十几岁就崭露头角，显示出卓越的领导才能。早年参加学生运动、工人运动，曾被派到江西安源协助刘少奇开展工人运动，负责编辑《安源旬刊》。他是数次重要武装起义的亲历者，曾参加南昌起义，随军南下广东潮汕；在湖南工作时，与彭德怀、滕代远等人发动平江起义；巡视两广期间，指导帮助发动百色起义。他是县委书记的模范，曾任兴国县委书记，在整顿充实党的基层组织、完成扩红任务上树立了标杆。他是红军政治工作的能手，协助王稼祥开展红军政治工作，积极筹备并开好有影响力的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会上明确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口号。他一生短暂而伟大，有着过人的政治智慧和坚定的革命意志。1935年牺牲时，年仅29岁。

1934年的秋季，中央苏区比往年显得愈加萧瑟冷清，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红军被迫踏上向西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根据中央指示，留守这里的红军将士迅速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以项英为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央军区，领导中央苏区游击战争。贺昌因腿伤未愈，不能远征，留下担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

主力红军撤走后，苏区的防守力量十分薄弱，仅剩下武装力量1.6万人，伤员3万人。国民党军来势汹汹，从北、东、西三面进攻，苏区面

积日减，最后仅仅剩下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县交界处的“三角地区”。面对四面合围的严峻态势，原定的死守根据地的方针，非但没有扭转局势，反而让留守红军陷入困境。物资和经费匮乏，武器弹药和人员补给困难，红军力量损失严重。留守分局多次电报请示中央，因中央在长征途中而一直得不到中央的最新指示。更加糟糕的是，与湘赣、赣东北等地的联系很快也彻底断绝了。

1935年1月下旬，国民党抽调重兵从于都、会昌两头挺进，企图将留守红军一鼓聚歼。贺昌等人敏锐意识到只有突围才能赢得一线生机。项英、陈毅、贺昌等迅速率领军区机关和部队由黄龙井塘村转移到禾丰地区。2月5日，一封“万万火急”的电报由中央书记处发来，明确指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几天后贺昌等人看到电报时万分激动，感到中央的指示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立即组织开会传达。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会议决定将留守苏区的人员和武装力量兵分九路，分别向闽赣、闽西、东江、湘南、湘赣等地突围。

各路突围从2月底开始，因陈毅、贺昌等人是最后一路，突围时间已延期至3月上旬。为便于行军，贺昌等人将所率部队编为4个大队，准备向福建长汀地区突围。出发前，贺昌扶着摔伤的右腿，向突围的红军战士作最后的动员。他语调低沉而不失激励地说：“同志们，2月28日，我们收到中央的来电，英勇的中央红军已经攻占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并在那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也为我们今后开展斗争作出了指示。当前，我们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形势相当严峻。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为了保卫苏维埃，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要以百倍的决心和勇气，同敌人战斗到底，直到流尽我们的最后一滴血。”

3月9日下午3时，贺昌、周建屏等人将突围部队集合完毕。这时枪声四起，形势危急，贺昌决定带两个大队先行突围，率领部队踏着泥泞的道路在山林间迅速行进。第二天早晨进入晓龙乡境内。天刚亮，正在抢渡濛江（安远河）的部队，就被埋伏在

贺昌：铁骨碧血映归庄

□ 赖俊

岸上的敌人发现，遭到包围阻击。贺昌强忍伤痛，率领队伍且战且走，突围出去。突围中部队被打散，伤亡过半，贺昌重新聚拢队伍，继续前进。贺昌率军突围至归庄时，又重新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敌人如潮水般疯狂扑来，身负重伤的他，一面组织部队凭借地形向敌人反击，一面咬着牙拼命射杀敌人。眼看子弹快要用光了，在敌人向他扑来之际，他宁死也不当俘虏，用尽全身力气，高喊“红军万岁”，举起枪将最后的一颗子弹射入自己胸膛，壮烈牺牲。